

故宮文物南遷九十周年

祝勇

1933年，為躲避戰亂，保護收藏在故宮裏的文物珍品免於損毀劫掠，一批老故宮人帶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離開紫禁城，開始了漫長的遷徙之旅。今年是故宮文物南遷啟程九十周年，由知名作家、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所著的新書《故宮文物南遷》近日出版，再現九十年前守護國寶南遷的壯舉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



知名作家、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。

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文物南遷箱。



祝勇所著新書《故宮文物南遷》，近日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。



第一批南遷文物箱在太和門前廣場集中。



文物在川陝公路艱難行進。

烽煙南渡顛沛萬里 「完璧」國寶延續文脈

「相比抗戰時期清華、北大、南開三所大學南遷的歷史，故宮文物南遷的研究要少很多。」祝勇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故宮文物南遷時延二十五年，地逾萬餘里，是人類文明史上規模最大的、在戰爭中保護文物的一個奇跡，希望通過書寫抵抗遺忘，記錄下這段延續中華文脈的歲月。

南遷文物件件珍貴

日軍進犯熱河後，山海關告急，平津形勢日益危險。祝勇介紹，局勢危急，踏上南遷之路的故宮文物件件珍貴，其中有總計79338卷的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有中國保存最完整的佛學大百科全書《龍藏經》，還有每隻重約一噸、上面鑄刻着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等等。其中任意一件，都有無可取代的歷史文化價值。

長途運輸轉移，古物難免途中不生損失。像陳倉先秦石鼓在地下埋藏了千餘年，在唐代出土時已無人能識，上面鑄刻的文字「一字可抵萬金」，因此對打包過程要求極苛刻，要先用極薄極軟的高麗紙蘸水浸濕，用簞子把濕軟的高麗紙塞進石鼓裂縫裏，而僅此一步驟就要花近一個月時間，然後再用薄棉花層層覆裹，用糝糊黏好，細麻繩捆紮。

笨重如石鼓者難裝，輕薄如瓷器者亦難裝。填白脫胎瓷器薄如蛋壳，為了不在顛簸中產生破傷，裝箱時需先在一塊厚棉墊在下面，瓷器裏鋪一層薄棉，用紙包好繫上繩子，然後把包與包間以及四圍用棉花塞緊，上面再蓋一層棉花一層稻草，最後把箱子釘好加封。

而為了避免受到日軍襲擊，運送文物的火車沒有從平津線轉津浦線直達南京浦口，而是捨近求遠，先走平漢線，由北平開到鄭州，再轉隴海線，由鄭州開到徐州，最後繞回津浦線，由徐州開往南京。火車車頂四周都架有機關槍，行駛路線與到達各站時間是最高機密，所經地方均派軍警護送，除了添煤、添水外沿途不停車。

躲避戰火南遷復西遷

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，南遷至南京朝天宮庫房的文物又要悉數轉移，分北、中、南三路運往西部大後方。其中，西遷北路由南京出發，經鐵路運至西安、寶雞，後由汽車運輸，在大雪中翻越秦嶺，進入四川，於峨眉山腳下落戶；西遷南路經過桂林運至貴陽，後轉至安順；西遷中路則從重慶出發，在宜賓中轉，運至樂山安谷鄉存儲。

祝勇指出，在日軍炮火的追擊下，老故宮人從沒有丟下責任，而是一日復一日、一站接一站地轉運文物，每到一地，都以極大的耐心與小心，進行防蟲、防潮、防火和防盜處理。



故宮職員在陝西漢中南鄭文廟前的合影，從左至右：那志良、梁廷煒、吳振鯤、曹錦如、吳玉璋。

當年在運送首批故宮文物走出紫禁城時，故宮曾要求每位司機和木板車工人在胸前都貼一枚帶「吉」字的徽章，既作為工作標識，亦企盼吉祥。祝勇提到，或是天佑國寶，此後遷移途中故宮文物幾次逢凶化吉。一次在由宜賓到樂山的水路上，織繩中斷，滿載文物與人員的木船成為「不繫之舟」，被水流裹挾向下游沖去。但誰也沒有想到，船在河水裏漂流了一段後竟自己向岸邊沖去，在河灘上擱淺。在它的前方，正是著名的樂山大佛。

另一次，汽車過綿陽一座簡易小橋時翻車，不過翻

車的地方剛好沒有水。負責押運的那志良先生（在北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工作七十餘年）說：「有人說，文物是有靈的，炸彈炸不到它，每次都在文物運走之後，那個地方被炸；現在翻了車，也毀不到它。」

文人報國艱苦卓絕

即便在動盪不安的日子裏，老故宮人亦仍漫無止境地整理索引和編目，按照文物所在的箱、行、列、庫一一編入目錄。這些目錄的水準很高，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著名考古學家李濟視察時，他們說出箱號，工作人員不出五分鐘便都找到了箱件。

「像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，他們也忍受着時世艱困、歲月清寒，卻沒有一天放棄過學術事業。」祝勇對大公報記者稱，讓他尤其感動的是，在峨眉武廟，那志良先生與先秦石鼓為鄰，每天辦完一天公事，晚間回到武廟，古佛青燈，伴他寫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《石鼓通考》。莊尚嚴先生一家，儘管吃的都是摻雜着穀殼稗子和石粒的「八寶飯」，仍每天看書、做功課，全家人的心與桌上那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「燈碗」一直亮着。

「那先生還曾回憶，某天的行程，『因為是個陰天，遍山皆雲，汽車出入雲海，風景格外好看。』沿途那麼艱辛，而且那麼危險，他們還能欣賞沿途的風景。」祝勇認為，負責文物遷徙的故宮前輩在途中都保持着樂觀的情緒，「雖倉皇疲憊衣履簡陋，但內心篤實堅定，這是文化人身上特有的一種堅不可摧的精神氣質」。

文物受損不及萬分之一

1945年抗戰勝利後，遷存文物集中運至重慶，並歷時兩年分批東歸至南京。再到1958年，除部分故宮文物分三批隨國民黨「遷台」，以及部分留在南京等地方，當年南遷文物安全回到「出發地」北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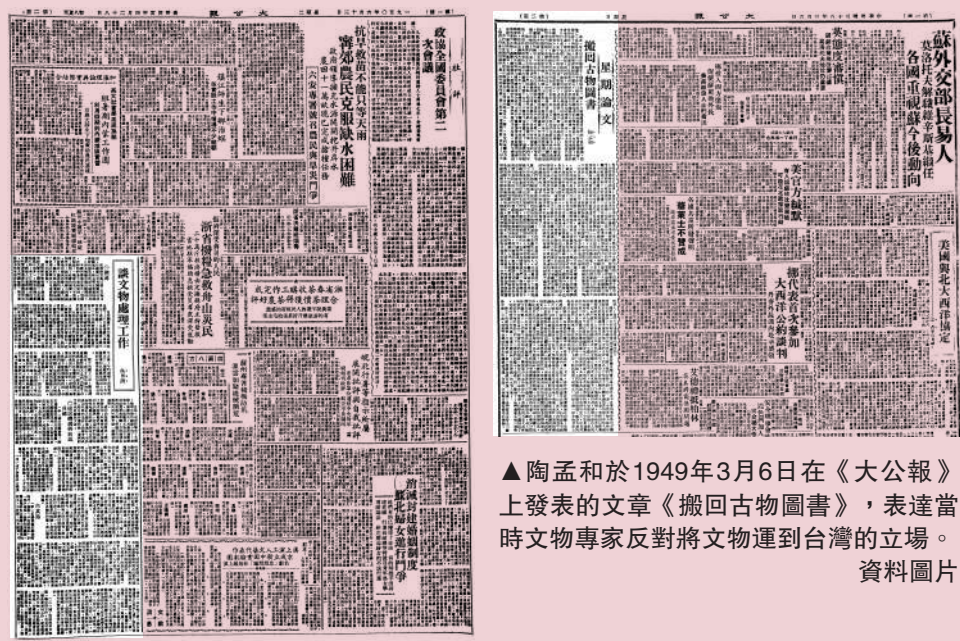
祝勇稱，經過無數轟炸，走過千山萬水，面對「潮、火、曬、蟲、摔」，說文物沒有損壞是不符合事實的。不過，在當時眾多博物館文物損失慘重的情況下，故宮文物損失甚微。有學者指出，在戰爭環境中，故宮文物受損不及萬分之一，「半壁河山，完璧國寶」，就算是在和平時期，要完成如此大規模的文物萬里遷存與保護，也是極為不易的，這在世界文物史上是極其罕見的保護奇跡。

「國寶在，國就在。可以說，故宮文物南遷延續了中華千年的文脈！」祝勇還對大公報記者指出，更重要的是，故宮文物在遷存保護中還在國內外進行了多次展覽，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文明，這在當時極大激發了國人的文化自信與抗戰必勝的信心。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吳瀛於1950年6月13日在《大公報》刊登文章《談文物處理工作》，陳述故宮「盜寶案」原委。資料圖片



陶孟和於1949年3月6日在《大公報》上發表的文章《搬回古物圖書》，表達當時文物專家反對將文物運到台灣的立場。資料圖片

查閱《大公報》獲重要資料

文物是從哪個碼頭出發，當時天氣如何，遭遇了幾級風浪……對每一個細節，祝勇都力求詳實準確。他介紹，自己創作《故宮文物南遷》有三個信息來源，一個是故宮博物院、重慶檔案館等地方收藏的文獻檔案，一個是當事人的口述、傳記、回憶錄，還有就是報紙上的報道，「新聞是對當下最快的同步記錄，但是經過多年之後，它反而成為歷史的文獻。」

「在報紙當中，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個就是《大公報》。在新冠疫情的間隙，我戴着口罩去上海圖書館查《大公報》《申報》，發現上面任何一條關於故宮的報道，都會特別興奮。」祝勇說。

在《故宮文物南遷》中，祝勇引用社會學

家陶孟和於1949年3月6日在《大公報》上發表的文章《搬回古物圖書》，表達當時文物專家反對將文物運到台灣的立場。此外，對於南遷初期發生的有名的故宮「盜寶案」，按照毛澤東、董必武的安排，吳瀛寫了一篇陳述案情原委的文章，簡明扼要地說明「易培基盜寶案」是有人「憑空捏造」「裏應外合」製造，這篇文章於1950年6月13日在《大公報》刊出，為所謂「盜寶案」最終定了性，文章也被祝勇在寫作中引用。

祝勇指出，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的很多相關內容，如抗戰的形勢，《大公報》都有非常具體的報道，給研究提供了特別寶貴的資料，成為今天重要的歷史見證。

文字虛實相間靈活有趣

1937年7月7日夜，盧溝橋事變爆發，驚醒了無數國人的「和平夢」。老舍先生在小說《四世同堂》裏寫到北平陷落時，只用了一句話：「天很熱，而全國的人心都涼了，北平陷落！」

「關於盧溝橋事變，我看了很多資料和文字記載，看來去還是覺得老舍的這句話最短，但是非常精準。」祝勇說。《故宮文物南遷》在介紹文物到達南京後又要「西遷」時，通過引用《四世同堂》裏的這句經典話語，簡單巧妙地就展示出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大眾心理。在大量的史實之間，祝

勇大膽地穿插虛構的文學創作內容，補充卻不「傷」史實，因此讀起來靈活、有趣，也更可感。

祝勇對大公報記者透露，在寫作《故宮文物南遷》一書的同時，由他作總導演，故宮也在拍攝一部同名紀錄片，來傳播這段延續中華文脈的壯舉。紀錄片的先導宣傳片已發布，但之後因三年疫情和資金困難而暫停。接下來，希望能把紀錄片繼續拍完。同時，自己也已馬不停蹄地投入同主題長篇小說《國寶》的寫作中，期冀通過潛心寫作這部規模宏大的歷史長篇，重構和再現那段波瀾起伏的歲月。

祝福香港故宮：行穩致遠

今年7月3日，香港故宮正式對外開放一周年，迄今已接待遊客人數超過120萬人次。祝勇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，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受到國人乃至於全世界的追捧，設立香港故宮展示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光彩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。祝福香港故宮能夠行穩致遠，越來越好！

祝勇指出，兩岸四地在文化上同宗同源。相較於九十年前故宮文物「被動」南遷，現在不僅抗戰早已勝利，而且中國人也已經站起來、富起來、強起來，今天「主動」南下，在

香港設立故宮文化博物館，是與世界分享中華文明的榮光，也是神州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反映。

祝勇還表示，香港故宮目前雖尚只開館了一年，但是裏面展覽文物所代表的文化傳統長達幾千年，希望在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，香港故宮能夠行穩致遠，越來越受到觀眾的喜愛。香港故宮的目標是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博物館，祝福它有一個美好的明天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